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文化与社会转型

WENHUA YU SHEHUI ZHUANXING

“西化”VS“中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不去的悖论 / 俞可平

理学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 / 廖可斌

家国同构与政教合一：

论儒家政治传统与民主政治之异质性 / 石元康

老子之“自然”的古典与现代解读 / 刘笑敢

启蒙思想的内在歧路 / 许纪霖

关于当代“鲁迅论争”的意识形态背景及鲁迅精神之现实意义的思考 / 钟雪萍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 冷 溶

革命传统文化对改革时期现代化构想的影响 / 曹天予

中国社会转型与两种现代性 / 高力克

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 / 林 春

冷战后帝国审美心态与中国民族国家的自我想像 / 王 斑

现代艺术、现代冲突、现代工人：

中国发展时代中的马克思 / 马歇尔·伯曼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D668

14

2006

文化与社会转型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与社会转型 /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7
ISBN 7-308-04840-3

I. 文... II. ①曹...②钟...③廖... III. 文化 -
中国 - 现代 - 文集 IV. 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5240 号

文化与社会转型

曹天予 钟雪萍 廖可斌 主编

责任编辑 钟仲南 王 萍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浙江大学世纪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324 千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840-3/G·110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序 言

本文集系根据 2004 年 7 月在清华大学和 2005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两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和讨论编辑而成。没有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提供的后勤支持,会议不可能顺利进行。我们在此对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筹备之初,有人提出,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有过文化热了,再来重复那些讨论又有什么意义?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热的背景是思想解放和新启蒙,其领军人物的基本观点:一是只有文化转型了,现代化了,社会才能现代化;二是文化现代化的唯一途径是引进外来文化:不管是尼采、海德格尔还是波普库恩,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只要是与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相对的,都对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都值得大力引入。与此不同,我们关心的是:(1)改革时期现代性构想的各种主要思想资源,(2)文化资源在现代性构想中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影响,(3)对改革时期所发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变化的文化(价值)评估,(4)文化与社会变革间的互动关系。

序

言

001

比如,有人企图用传统文化资源来构想一种值得追求的现代社会。比如说,尽管儒学与个人、自由和民主难以协调,但它是否可以 为社群主义共和理想提供一些思想资源呢?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否包含着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倾向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只是一种用家庭模式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前现代模式,而不是一种与西方现代社会不同的形成社会共识、提供社会凝聚力的另类途径吗?对于这些涉及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重大问题,共识尚未形成,因而必须认真探讨。

又如,五四传统对改革时期的现代性构想影响极大。所谓新启蒙,说到底不就是想用五四文化来重新界定我们的社会理想吗?可是五四文化的主线到底是对科学、民主、人权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解读,还是作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解读呢?如果说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启蒙后的实际历史发展是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对于改革时期的从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回到自由主义现代性(新启蒙)的文化走向,又该如何评价?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于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和实践,成功和失败,究竟应该怎么看?新时期与改革开放以前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讨论这些问题、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评价时,人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应该是什么?

一个公认的出发点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没有活力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寻找新的道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新的道路指的是什么?是加入国际分工与全球全面接轨,还是在经济接轨的同时,在政治上文化上仍保持中国特色?但是,要谈中国特色,就得回答,这种特色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可能性的根据何在?在这些问题上,理念不清,讨论就难以深入,评价就易失公允,行动就会没有主见,急剧变化中的我国社会到底会走向何处,就会无从说起。

可是理念的根子还在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主义和平均主义理念,五四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理念,革命文化中的反对阶级剥削的理念,以及党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除了这些“本土”资源以外,外来文化在改革时期

的文化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伦理社会政治学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程序民主的政治理念,正在有力地把中国拉向西方。与此同时,西方反主流的激进的文化批判,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历史学说(世界体系理论),以及批判现存国际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核心—边缘”理论,则为寻找非西方道路的人们提供了种种灵感。没有人会否认,内外文化的互动是我国改革时期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以及内外文化互动的探讨,是本文集的主题。当然,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开几次会出几本书,不可能形成共识。抛砖引玉,为进一步广泛深入的讨论从特定的角度开个头,是我们的本意。

但与此同时,改革时期文化与急剧变动中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向人们提出了有关文化本性、文化的(辩护或批判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化对社会转型可能的导引作用等理论问题。对于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下一次研讨会和下一本文集的主题。

曹天予

2006年1月6日于波士顿

序

言

003

目 录

引 言 曹天子 钟雪萍/001

“西化”VS“中化”: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拂之不去的悖论

..... 俞可平/011

边缘正义:

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及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意义

..... 陈维刚/047

在哲学与人类学之间:

关于儒家经验的近代哲学命运的思考

..... 杜瑞乐/063

“以对方为重”:梁漱溟的儒家伦理观

..... 陈 来/088

理学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

——对理学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思考

..... 廖可斌/109

家国同构与政教合一:

论儒家政治传统与民主政治之异质性

..... 石元康/125

目

录

001

老子之“自然”的古典与现代解读

..... 刘笑敢/142

个人认同与人格境界

..... 刘 东/157

启蒙思想的内在歧路

..... 许纪霖/164

关于当代“鲁迅论争”的意识形态背景

及鲁迅精神之现实意义的思考

..... 钟雪萍/196

独特的超越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 龚育之/212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为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 冷 溶/223

评论:

革命传统文化对改革时期现代性构想的影响

..... 曹天予/232

“一而三,三而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阶段的互动略论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现代性具有的文化资源

..... 唐少杰/234

中国社会转型与两种现代性

..... 高力克/247

中国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

..... 林 春/254

进步论:中国文化复兴的紧箍咒

..... 河 清/261

论戏剧能动性

——在全球化时代中对中国艺术传统的重新思考

..... 颜海平 /270

“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

——关于电视纪录片《毛毛告状》

..... 吕新雨 /299

冷战后帝国审美心态与中国民族国家的自我想像

..... 王 斑 /325

现代艺术、现代冲突、现代工人：

中国发展时代中的马克思

..... 马歇尔·伯曼 /342

目

录

003

引言

曹天予 钟雪萍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过程的起点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咄咄逼人的外部势力使中国的精英产生民族存亡的“深层”危机感,力图加强军事实力以强国自保。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其特征是挥之不去的(应对外来压力的)内部危机感:在器物层面对引进西方科技工业管理存在着共识的同时,在典章制度(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或“制度文化”)的层面上如何应对西方的影响和压力,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可以说,“制度文化”是转型社会话语斗争的焦点。

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新阶段。由于全面积极地参与全球化,中国社会处于十字路口:是被整合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去,还是另有他路可循?与此相应,在有关制度文化的话语斗争中,各种思想资源碰撞冲击,此消彼长。作为本文集基础的两次研讨会,其主题就是探讨本土的文化资源(包括传统文化、五四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及其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涌入的各类西方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中俞可平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中化”“西化”争论的梳理和思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要点在于认清这一争论本

引

言

001

身是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是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认清这一争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并正在继续影响着转型的过程和方向。重新审视这一资源,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自身的历史能动性,既不被“全盘西化”所迷惑,也不被“中化”或简单的民族主义所左右。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思考争论和探讨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批评,主要围绕着传统文化、五四文化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而展开。无论焦点放在哪一类,批评的倾向性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二十多年来的基本走向,对传统文化从批判和否定转为弘扬和继承,对五四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则从弘扬到反思。至今少有展开的,是将三者放在一起,考察它们在当下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以何种形式出现,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些本身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思想资源,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考察的是,这些思想资源和历史选择对中国当下的转型和选择是否有所启示?

二

要超越简单的“中化”“西化”之争其实不难。事实上,中国现有的本土文化资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即使是“传统文化”,其实也是近现代西方思潮涌入后的产物。概念上,“传统文化”只有与“现代”相对立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在外来压力和内部危机感的语境中被建构出来或“重新认知”的。因此,如何解释、面对或坚持“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个“现代”问题。

五四文化以“中化”“西化”之争进一步深化为特征,其历史背景则是民族自决。这一文化的发展,尽管与清末民初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其影响力之深远复杂却与官方宣传关系不大,而主要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验,是外来压力带来的内部危机感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文化与外来压力互动中主观能动性的集中表现。

五四文化激起了各种探索社会转型的文化思考。这些思考与

“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和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关联。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对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的产物,是中国革命性的社会转型尝试的前提和产物。对这一文化的认识和争论,清楚地表明了,处于急剧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在制度文化上何去何从,理论界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本书中,六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文化”作为当前构想“现代性”的文化资源之一作了探讨。尽管选择的问题和切入点不尽一致,但关注的焦点却不无呼应之处。陈维刚的文章,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思路。从资本主义在西方和非西方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从一些非西方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照搬西方模式所引起的“边缘化”现象及其恶果出发,陈维刚指出,要打破西方强势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边缘资本主义”的格局,非西方社会必须认清自身文化的特性,在接受“现代化”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把握自身文化的合理因素,把握自身的选择,从而走出或者避免陷入“边缘资本主义”的怪圈。

就中国而言,19世纪下半期以降,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之褒贬不一,自然与特定的“现代”历史语境有关。但是“传统文化”作为实践和价值观的来源,继续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简单地“回归传统”当然不可能。真正重要的是,认清“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对其进行批评性的梳理,寻找能令其中的“合理”成分发展为“现代理性”的契机,从而打破长期存在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并为超越基于工具理性的西方现代性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其他五位学者的文章与陈文相呼应,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下的选择作了新一轮的思考。杜瑞乐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儒家思想的“哲学化”,指出盲目“哲学化”带来了儒家思想的文化历史及其现实意义的忽视,其后果是积极的儒家思想无法在思想层面上找到契机使之得以传承。陈来、廖可斌、石元康、刘笑敢等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一些看似熟为人知的话题,从“思想资源”的角度作了新的探讨。陈来对梁漱溟在探讨传统人际关系时弘扬“以对方为重”思想的分析,针对现代西方以个人为重的文化逻辑,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

有与之不同的自己的文化逻辑。“以对方为重”的思想可以理论化，成为构想现代性时的价值标准之一。

廖可斌对“理学”的重新思考具有认识上的拓展意义。在人们对“理学”的负面意义普遍认同的现实语境中，他大胆提出对理学分别作“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层面上的思考，并对其“现代价值如何可能”加以探讨。既不回避“理学”在历史中出现的负面作用，又指出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理学的可能形态”的可能性及其积极意义，其中特别是理学“所倡导的追求主体理性精神独立自觉的精神”。

石元康的文章立场鲜明。在政治制度、政治理念领域内，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的理念和建制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不超越这种传统文化，民主政治无从谈起。

刘笑敢在讨论道家的“自然观”时，强调其“人文”意义，进而肯定其潜在的积极意义。刘笑敢的讨论，间接地回应了陈来在讨论梁漱溟时提到的三种关系，即人—物、人—人、人—己关系。道家的（人文）自然观表面上较多注意“人—物”关系，实际上还是落脚到人—人、人—己关系上。这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流派在人文思考上的互动关系，从而应使我们进一步注意这一文化资源的现实意义。

五四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提倡回归五四，提倡新启蒙；20世纪90年代着重的却是对五四的“重新评价”：力图突出其中的自由主义诉求，对其民族自立和社会变革诸方面的诉求，及其与国际大背景的关系，则通过“重写历史”予以质疑甚至否定。这样的走向，本身只是后冷战时期“反思革命”这一基本语境的产物，并不能据此推论：作为文化资源，五四传统的多面性，特别是它的革命性的遗产就不存在、不起作用了。实际上，一方面，五四时期引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仍然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来源，继续影响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科学民主和个性自由等概念仍然界定着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又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和革命现代性的精神源头。可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压力下，在反对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否定民族自决权及其文化道义基础的话语斗争，在过去二十年中，竟然导致了对五四文化中民族主义

和革命精神的质疑甚至批判。

值得指出的是,当下中国对五四文化的负面反思,主要源自西方的华学界。西方华学界对五四的批判,主要基于三个价值判断。一是认为它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了头,应予纠正。有意思的是,这一价值判断来自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学术立场:新儒家和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女性主义学者。二是认为对五四文化的过分关注,掩盖了清末民初与五四文化取向不同的现代思想传播的历史作用。三是对上述与五四文化有本质区别的现代思想的肯定,即肯定其非全盘西化性、非革命性和非强烈的民族主义性。在这些价值判断的引导下,华学界出现了“重写”五四文化的学术潮流。将这一学术潮流放在20世纪末全球政治大环境中考察,立即可以看出它与冷战后西方“后革命”、“后民族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密切相关。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引发的后殖民理论强调对“后殖民”文化的殖民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而推荐一种“非西方”的对西方“现代理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类“非西方”的批判又顺着后现代主义的思路推广成为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诉求的批判,特别是对其中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现代性的批判。这一(从激进思潮引出反动推论)悖论的真实含义在于,本意在反西方的后殖民理论的西方中心论实质,被全球资本取来为其破除国界的需要服务。

如果说这一学术潮流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话,主要在于它将五四文化与清末民初引进西方思潮的历史联系了起来,并指出了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一努力对于认识五四文化的渊源、多元性及其历史局限性不无助益。但是,这一认识并不能消减五四文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更不能用来否定其作为当代中国现代性构想的主要文化资源这一基本事实。同时,对于这一潮流否定革命、否定五四时期民族自立诉求的意识形态倾向,更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本书中有好几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五四文化以及当代围绕着五四文化而展开的争论进行了讨论。尽管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些文章涉及的正是五四文化对当代现代性构想的深刻影响。俞可平在讨论“中化”“西化”之争时强调指出,从当下的角度去观察,“中化”“西化”之分充满了各种悖论。从这个意义出发,对五四文化的认

识,既需要对其历史环境有充分的认识,又需要对其在构想现代性时所产生的影响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更需要对五四以来对它产生的各类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背景有清醒的认识。

许纪霖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概述,勾勒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时期从“回归五四”到“启蒙的自我瓦解”的思潮脉络,分析了他们在立场上的分流与他们对五四文化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本身间接地反映出五四文化复杂的历史作用及其现实地位,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五四的传人又是五四的反思者的复杂地位。

与之相关但又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钟雪萍关于当代“鲁迅论争”意识形态背景的讨论,将改革开放以后的“鲁迅论争”置于冷战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思考。文章指出,在有关鲁迅的当代论争中,某些价值判断来自西方反对革命、反对民族自决的后现代思潮的价值取向,而这些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来说,源自 20 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话语霸权。为了认清这些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首先应该注意到,鲁迅的批判精神,是在批判传统文化、质疑西方现代性这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对鲁迅思想上这一复杂性的认识,既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鲁迅的情绪化的争论,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澄清鲁迅对现代性的认识。借用王斑的话:“鲁迅对个体的思考包容了现代激进的个人独立性、自主性,同时推而广之,独立自主也使用于扎根传统文化和生活世界的群体性,也就是民族自决。两者的关系是正面的,互动的。”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在当代现代性构想的文化资源中最有争议。“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痛至今仍让不少人感到不堪回首,从而也使人们将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与革命的消极面联系在一起,难以认同。可是,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给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带来的变化,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仍然深刻。对于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和观念上的变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构想现代性时的核心文化资源。人们一方面否定革命,另一方面又生活在革命带来的变化及“后革命”改革开放时期的结构性影响之中。因此,中国的革命传统文化,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及其后

继者邓小平时代的文化,无疑是中国当代现代性构想中的核心,有必要认真研究。

对于这一文化资源,龚育之和冷溶基本上从肯定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而唐少杰基本上从否定的角度作了归纳。曹天予对这三篇文章的评论,其出发点是,首先确定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内容是:(1)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2)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实践路线,(3)人民共和国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制度。就方向而言,这个革命传统具有普遍性。但是,这一普遍性又只能以一定的民族形式出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理念与苏联的就大不一样。其次,以理性标准、工业化标准和民族主义标准来判断,这种革命传统在理念上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同的)现代性。再次,从中国革命传统中普遍性内容和特殊性内容的角度来看其对改革时期现代性构想的影响:(1)邓小平时期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与一系列意识形态教条决裂,体现了相当彻底的批判精神。(2)就其批判理性为之服务的价值目标而言,邓小平关注的主要是法治建设(不要群众运动)、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是禁忌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按要素分配,都因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具有了合法性。(3)尽管在经济模式上有指令经济(加群众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分,意识形态上有意志论和实事求是之分,但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构想完全一致。最后,邓小平构想的以市场为依托、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其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市场经济的形式,在那里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剥削。这将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彻底实现,也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为一体。不管最终能否找到这样一种形式,中国革命传统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无疑仍然是改革时期现代性构想中的核心成分。

三

如果说这些中国本土的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改革开放时期由西方涌入的思想资源尽管包罗万

象,但大体上可分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包括深刻地影响了经济改革方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力图影响政治改革的各类自由主义社会政治学说,和对资本主义作出某种批评的种种激进思潮。本文集编入的有关文章,讨论的焦点仍然是“制度文化”。

高力克的文章引入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的两种定义,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性定义为解放性的现代性,但更多地认同与之不同的“技术现代性”,认为这一现代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现代性的手段”。作者的这一观点颇具代表性:认定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普世的“技术现代性”,而中国也完全可以走这样一条技术现代性的道路。

林春的文章则大不相同。它把注意力集中于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本土资源,首要的是中国革命的遗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她认为,这一遗产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源泉,永远的骄傲;而当前的翻案思潮,早已超过“告别革命”,成为一种否定革命、讥难革命的时髦。可是,革命的一切弯路、失败、错误、代价,都只有在认识其根本的道义正当性和实践历史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真正的总结。而今日中国能够引以自豪的一切成就也莫不以革命的胜利为前提或基础。林文试图概括中国革命的功过、矛盾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包括新中国的探索,从而澄清一些 20 世纪革命史中与我们今天的追求和自我定位息息相通、不可割断的基本理念和概念;同时指出我国社会目前危机的根源不在接轨不足、市场化不彻底,而是在发展模式、公共政策等方面背弃革命初衷的结果。林文强调,在后冷战全球整合时代,一个被标新立异的远大理想所激励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更亟须实事求是地认识、捍卫并批判性发扬自身宝贵的革命现代传承。

河清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与高力克的观点商榷,即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首先需要反对西方的“进步论”。作者认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影响中国极深的“进步论”。这一“进步论”将中国文化置于落后的地位上,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人在制度文化问题上自轻自贱,对自身的文化传统一味否定,对西方文化则盲目崇拜。

许纪霖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思想界状况的评介,既有描述